

编者按:流入人口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资源,是浙江建设人才强省、创新强省的强大动力,也是缩小收入差距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组成部分。数据显示,省外流入人口已占浙江常住人口25.1%,居全国省区首位。人口流向背后透露哪些信号?浙江靠什么持续吸引人气?敬请关注本报调研报道。



# 他们,为何而来

## 浙江省外人口流入调研报告(上)

本报记者集体采写



工人建设  
杭海城铁  
拍友 王超英 摄



2021年嘉兴春季人才交流  
大会现场 嘉兴市人社局供图



人们在梦想小镇留影  
未来科技城  
管委会供图



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 国家大学科技园管委会供图

从K352列车下来的时候,22岁的四川达州人王巧两手空空,除了一腔冲劲。

那是2014年的4月。他的目的地本是上海,因30多个小时的“晃荡”严重晕车,只好提前在嘉兴出站。随后8年,这个小伙子的人生,便随着这座城市的发展逐渐出彩——酱鸭店招工,他学会了一门手艺;创业潮涌动,他办起了酱鸭厂;借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机遇,又把酱鸭卖到了上海……

回过头看,王巧感激当年的决定,“迁徙,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回报?”

最近,浙江各市陆续发布2021年人口主要数据公报。按照5‰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推算,过去一年,全省常住人口增加72万人,其中,自然增加人口6.5万人。也就是说,绝大部分净增人口,都从省外流入。

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展示的增量,更为精确:以202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,10年间,浙江省外流入人口增加436.2万人,增幅高达36.9%,规模相当于2个衢州市的常住人口。

他们来自哪里,去往何处?增长的数字,透露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密码?近日,记者来到杭州、温州、嘉兴、金华等地调研。

### 每4个常住人口中有1个来自省外

### 持续流入背后的区域发展活力

记者展开调研时,正值元宵节前后。无数人告别家乡、出行返程。众多目的地中,浙江,无疑是极具魅力的一站。

“七普”数据显示,2020年,全国按户口登记地在省外的人口达12483.7万人,其中,跨省流入浙江1618.6万人,占13%,仅次于广东,居第二位。对照浙江人口规模,省外流入人口占全部常住人口比例,已从2010年的21.7%上升到2020年的25.1%。也就是说,每4个常住人口中就有一个来自省外。

“这一比例,居全国省区第一位。人口持续‘用脚投票’,证实浙江的吸引力和竞争力。”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郑晓峰说,作为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,充满活力的市场、较高的收入水平,创造了巨大的人口流入空间。

这一气质,在“世界超市”义乌显露。“最早我在ebay开店,要去上海城隍庙拿货,价格贵,还经常断货,辗转打听到货源就在义乌,到了一看,这里什么都有。”这是福建人赖万兴扎根浙江的第14个年头,他一手创办的夏歌跨境电商公司员工近800名,“只有十来个人是本地户籍。”

就在元宵节前,赖万兴刚与来自天南海北的7.5万市场经营户一起,见证了义乌国际商贸城开市盛况,迎接线上、线下12万余客商洽谈、交易。偌大的商贸城,还连起电商、物流等70多万家企业,吸引各类从业人员。

据悉,2010年至2020年,义乌常住人口增加62.5万人,是浙江人口最多、增长最“猛”的县级市。2021年,当地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7468元,实现了人口和收入协同增长。

“社会经济越活跃,人口流动强度和频度越大,生产力就越强,这是规律。但区域一体化发展加快,城际轨道建设加速,叠加大城市生活压力上升等因素,也在影响省外人口流入速度和分布区域。”浙江大学

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米红认为,近年来,全省人口增量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周边县区外溢趋势,形成以都市圈为核心的人口“引力场”。

毗邻杭州的海宁,就是一例。2014年以来,随着杭海城际铁路布局,杭州都市圈建设效应逐步显现。“交通通达程度和县区知名度同步提升,特别是浙江大学海宁校区、杭嘉一体化发展合作先行区等大项目落地,大大拉动了省外人口流入,‘七普’期间海宁常住人口突破百万大关。”嘉兴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,以2021年企业用工情况为依据,海宁共有32万余人参保,省外户籍员工约12.9万名,占比近40%,规模可观。

进一步分析“七普”数据,可以发现,继2010年之后,安徽再次成为流入浙江人口最多的省份,达313.9万人,江苏流入浙江人口数量增加13万余人,与长三角城市群互动、一体化发展脉动相符。从流向看,杭宁温仍是省外人口流入最多的城市,金华、嘉兴紧随其后,人口分布区域符合浙江四大都市区建设蓝图。

“我们研发机械臂需要大量人才,也要求有完善的零部件供应和上下游产业协同。”王海滨任职总经理的浙江凯富博科科技有限公司,于2019年6月成立,“落点”就选在金义一体化发展的“桥头堡”——位于金义新区的金华科技城。

这里向西是金华城区,向东是商贸活跃的义乌,向南是五金之城永康,既能享受公共服务辐射,又有产业集群支撑。随着金华市域“一盘棋”统筹加快,义东高速、金义东市域轨道交通等一条条“动脉”,打破县域“小圈”,成为人、物、信息、资金沟通的廊道。

短短三年,随着50多个项目入驻,科技城从一片荒地变为人口流入“高地”。2021年末,金华常住人口712万,坐稳浙江人口第四大城市位置,其中,金义新区在过去10年间新增19.13万人,功不可没。

### 浙北流入加快,浙南流入放缓

### 一升一降之间的产业转型节奏

对一个地区而言,庞大的省外流入人口,既是反映地区经济活力的“硬指标”,也是高质量发展的“源头活水”。过去十年,尽管整个浙江的人气持续红火,但这场人口增量“比拼”中,各个城市之间有喜有忧。

比如台州,集聚省外流入人口数量先后被金华、嘉兴超越,掉入第二梯队。近些年,连全市常住人口数量也被金华超越,排名浙江第五。此外,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常住人口数量居全省首位的温州,现列杭州之后,居全省第二位。十年来,省外流入温州人口增长放缓,2020年全市吸纳229.4万省外人口,占全省比重从2010年的23.1%下降到14.2%。

冬末春初,正是就业旺季。驱车从温州城区向浙南产业集聚区滨海园区行进,一路上记者见到数家企业门口摆出桌椅,拉起大红横幅,写着“诚招男女普工”。

“早几年都是应聘的人主动上门来问,再不济,劳动力市场转一圈,人也招全了。这两年,普通车间工人难招,高级技工只能靠猎头找。”2012年底,从武汉远赴温州,一直在奔腾激光(浙江)股份有限公司担任高管的徐侠,亲历企业用工从“卖方市场”向“买方市场”转变的过程,“疫情有部分影响,更重要的因素是产业转型,随着皮具、鞋服等行业小微企业大规模腾退,原先靠‘老乡带老乡’效应集聚在温州的省外人口,正在转移‘阵地’。”

数据表明,目前,省外流入人口中,男性占多数,16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近90%。“人口流入的主因仍是就业,就业结构与产业形态相辅相成。”米红认为,推动产业升级,实现区域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变,是发展的必然要求,但这一过程中,尤其要关注节奏,小微企业腾退与头部企业培育

速度、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与先进制造业集聚效率,要相互“适配”,“人口一旦大量流失,重塑优势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”

2月最后一周,杭州正式“官宣”:2021年末全市常住人口突破1200万人。对比10个区数据,上城、滨江、钱塘,临平更呈现明显的“人口倒挂”现象。以钱塘区白杨街道为例,54.9平方公里土地上,有常住人口33万多人。其中,20万余人属流动人口。

撤去高教园区这一因素,集聚在白杨街道的1.6万家企业,为省外流入人口提供了丰富的就业机会。近年来,在阿里、海康等“大厂”带动电商、数字安防等产业发展,吸纳大量高端人才、大学生以及灵活就业人群之际,杭州更在抓紧补短板,2019年市里发布“新制造业计划”,以实现数字经济和制造业双轮驱动,2021年,杭州工业投资同比增长15.2%,为近10年来最高,随着项目落地、投产,高端制造业及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带来的人口集聚效应,还将不断释放。

目光再回到义乌,近5年来,这个因商而兴的县级市,一边不遗余力,巩固针织袜业、流行饰品、化妆品、玩具等20多个优势行业;一边花大力气引进270余个重大项目,打造信息光电和汽车制造两大千亿元级现代制造业集群。据统计,仅地处义乌经济开发区的光源科技小镇,今年就创造就业岗位2万多个。

金华人口分布情况表明,尽管“金义一体化、全域同城化”的共建效应开始释放,但义乌、永康、东阳仍是省外人口流入的主阵地。究其原因,人口集聚本质上是产业集聚。



### 高学历人才和年轻人占比上升

### 人口结构和质量变化透露创业创新潜力

省外人口流入的系列“信号”,正在倒逼城市做出改变。

走进瓯海区的温州市国家大学科技园22号楼,记者遇见刚从实验室出来的肖遥。过去半年,这位来自湖北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博士后,拒绝了四川大学、南京理工大学、深圳大学等高校邀请,选择加入温州大学俞术雷教授的团队、共同组建碳中和技术创新研究院,“团队总共20多人,包括温州市高层次人才15名,来自江西、黑龙江、河南等多个省份。”

“论待遇,温州比不上深圳,论学术资源,也没有北京、上海强。但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渴望,温州数一数二。”肖遥博士说,研究院入驻科技园,除享受场地免租等优惠政策外,温州大学和瓯海区政府分别配套5000万元、4000万元科研经费,用于支持科研成果产业化。眼下,研究院的钠离子电池生产线已布置完成,正向规模化生产发起冲刺。

近年来,类似这样的创新平台,温州累计打造、引进39个,瓯江实验室入选省重点实验室,环大罗山科创走廊成为浙江三大科创走廊之一。2021年温州城市人才吸引力升至全国第27位。此外,正威(平阳)长三角电子信息产业中心、瑞浦新能源产业基地等百亿元级项目密集落地,“聪明”大脑与“重磅”项目携手而来,刷新人们的认知。

“像瑞浦新能源这样的高新企业,用工难问题更多表现为结构性短缺,我们推荐过不少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、就业困难人员,但企业需要的是更有文化、有能力的技术工人。当前,整座城市里,新能源、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,电气、泵阀等传统产业也在进行数字化改造,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场景逐步会被更为智能化的工厂所替代。”温州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说,过去两年,他们与贵州、江西等地的近200个市县建立跨省劳务协作关系,在守住省外人口流入“基本盘”前提下,启动实施高校毕业生招引“510”计划,开展市内外双线引才893场,服务企业4.7万家,发布岗位118万个,新设170个“高校人才工作联络站”。2021年,全市新引育大学生

12.67万人、技能人才9.76万人。

人口素质变化,也显现于浙江1600多万省外流入人口受教育程度中。2020年跨省流入浙江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,相比2010年提高0.6年。大学专科及以上高学历人口从45.3万人增加到146.8万人,比重从3.9%上升到9.2%。

“余杭越来越‘年轻’。”在未来科技城采访,基层干部、企业员工不约而同感叹。确实,积蓄多年数字经济能量持续扩散——梦想小镇、海创园内,分布数百家数字经济、生物医药企业,众多年轻团队穿梭其间,之江、良渚、湖畔实验室里,青年科学家在“无人区”中探索未来方向,五常街道内,电商、直播、时尚等新业态,如磁石般吸引着人们的目标。

由此,“年轻”所指代的,正是这片区域不断下降的人口平均年龄。余杭区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2021年全区新增就业人口5.45万,总计参保就业人数40余万人,平均年龄约32岁,“这一人群大部分是省外、市外流入人口,像五常街道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例,已经达到7:3。”

蓬勃的朝气,又反向带来浓郁的创新创业氛围,塑造区域高质量发展新优势。以余杭区为例,202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502.20亿元,同比增长7.5%。全年新增507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,数量居全省第一,新增科技型中小企业1292家,在规模工业增加值总量中,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、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占79.7%、51.1%。

当然,我们也要清醒看到,省外流入浙江人口受教育程度偏低。“客观地看,大量省外流入人口承担了本地人不愿做的工作,降低了生活成本,增加了市场供给,为流入地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。”郑晓峰认为,如何更好保障这一群体的社会权益,如何提升流入人口知识技能水平,实现“人口红利”与“人才红利”双增长,是一篇大文章。

如何打造优质共享的公共服务体系,如何构建宜居宜业的社会环境?且看下篇。

(本报记者 沈晶晶 谢丹颖 何贤君 王艳琼 唐骏奎 王杭微)

### 专家观点

## 打开流动之门

浙江大学人口大数据与政策仿真工作坊主任 米 红

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时代背景下,浙江的人口变动与发展呈现出新特点。可以预计,未来几年将是全省人口发展特征转变的过渡时期,数量型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将逐渐关闭,新生人口数量出现下降趋势,老龄化程度也将持续加深,外省人口的流入仍然会是未来浙江保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、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。

基于此,对浙江人口发展规划提出以下几点建议——

首先,继续大力鼓励人口跨省流入,有条件地放松落户政策,完善人才引进政策,吸引高能劳动

适龄人口流入或迁入浙江发展,通过实现人口的机械增长来带动常住人口的增长,降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。

其次,充分挖掘质量型人口红利,大力提升教育水平,提高基础教育教学质量,提升省内高等教育覆盖率,逐步提高全省常住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,进而增加人力资本存量和综合人口素质,进而增强全省人口文明程度和核心竞争力。

最后,释放老年人口发展潜力,适当延后现有的老年人口年龄起点,在加大多层次养老服务供给基础上,扩展老年人口的生活空间与选择。